

研究综述

Yan Jiu Zong Shu

西方数字游民研究述评与中国启示

□ 姚建华 杨涵庚

摘要：数字游民是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实现远程工作并借此获得自由探索世界机会的群体。他们代表着一种新兴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西方学者围绕数字游民的个体流动、地理套利、工作与休闲平衡，以及线上与线下社区营建这四个密切相关的核心议题展开了大量既有理论深度又充满社会关切的研究。在梳理、归纳和评述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一方面，这些学术成果对中国数字游民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另一方面，在中国大陆学者借鉴相关学术成果时，应充分认识到中西方数字游民的差异，这对于深刻理解和阐释中国数字游民这一新型社会群体带来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迁至关重要。

关键词：数字游民；流动；地理套利；自我品牌化；社区营建；乡村振兴

DOI:10.19633/j.cnki.11-2579/d.2023.0142

1997年，前日立公司的CEO牧本次雄和英国记者大卫·曼纳斯在《数字游民》一书中，以高度创新和前瞻的方式提出了“数字游民”这一概念^[1]。他们预测，不久的将来，高速无线网络和强大的移动设备将彻底打破职业、地理区域以及线上与线下空间的边界，为一种“游牧式”生活方式开创无限可能性。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士将通过各类数字化工具实现远程办公，以克服地理空间的束缚，并凭借线上工作的收入在全球范围内旅行。这种生活方式特别吸引年轻人，因为游牧式生活方式有助于他们远离传统的朝九晚五工作模式、狭小逼仄的办公空间和令人烦恼的通勤，同时提供高度的灵活性和自由度，使工作、休闲和旅行有机结合起来，实现“边工作边旅行、边学习边交

友”的美好愿景。

在过去三年新冠疫情肆虐的时期，数字游民凭借自己独立的工作地点和适应远程工作的能力，在规模上经历了爆炸性增长，大大加速了游牧式生活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2]。根据MBO Partners发布的2021年数字游民报告，美国数字游民的数量在2021年达到1150万人，比2019年的730万人增长了112%，而2018年这一数字约为480万人^[3]。英国就业统计机构The Instant Group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球数字游民数量已达3500万人，其中以30多岁的年轻人为主，占总数的47%^[4]。在这个群体中，从事编剧、翻译、在线教育、电子商务和文娱产业的数字游民数量最多。然而，越来越多来自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生物

技术等新兴产业的从业者也积极加入数字游民的行列之中。数字游民群体在职业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

在中国,内容创业、Web3.0技术、社会压力以及躺平现象近年来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西方舶来的“数字游民”概念及其相关实践在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知乎、一条、抖音、小红书等)上频繁涌现,已渐为大众所熟知,这种生活和工作方式尤其深受“Z世代”的认同。智联招聘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于2022年10月12日联合发布的《2022雇佣关系趋势报告》显示,中国76.4%的“00后”表示愿意成为数字游民^[5]。国内多家自媒体已对数字游民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报道,涉及多个方面,包括:他们生活方式的基本特点、机遇与挑战,流动和自我认同,以及数字游民社区的构建及其对未来工作的影响等。毫无疑问,数字游民已经成为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新型社会群体,并且正在引发社会各领域的连锁反应。然而,由于学术研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当前国内学界对数字游民群体整体关注不足,对相关问题的学理分析和系统阐释尚付阙如,理论成果也相对稀少,仅有几篇介绍性的文章零星发表在一般性学术刊物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学界已经对数字游民问题展开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一大批兼具理论深度和社会关切的学术成果。

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围绕个体流动、地理套利、工作与休闲平衡,以及线上与线下社区营建这四个密切相关的核心议题,系统梳理、归纳和评述西方数字游民研究成果。其次,文章指出:这些研究为中国大陆学者提供了重要启示。借鉴这些理论成果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和阐释中国数字游民这一新型社会群体带来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迁。最后,本文强调,在借鉴西方相关优秀理论成果的同时,中国数字游民研究者应充分认识到中西方数字游民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价值观念、政策环境,以及数字游民工作和生活所依托的平台媒体等方面,还包括中国“乡村振兴”和“数字乡村”这两个发展规划对数字游民的深远影响。数字游民议题涉及的种种问题与当代青年的发展和国家的未来走向息息相关,因此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和研究价值,值得跨学科研究者们共同深入探索和思考。

一、什么是“数字游民”?

2021年,美国社会学家贝弗利·尤恩·汤普森教

授在她的代表作《生活在边缘的数字游民:零工经济中远程工作的笔记本电脑企业家》一书中,对“数字游民”这一概念进行了全面且详尽的阐述。在她看来,数字游民是那些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在任何地方都能进行远程工作,并从中获得自由探索世界机会的群体^[6]。这与凯莉斯·纳什等学者对数字游民工作要素的概括相一致,即数字游民工作的核心要素包括:数字工作(digital work)、零工工作(gig work)、游牧工作(nomadic work)、探险和全球旅行(adventure and global travel)^[7]。他们认为,数字游民是上述四个要素的综合体,缺一不可。一方面,数字游民的兴起与互联网技术、数字工作和零工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它们为数字游民提供了更多工作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另一方面,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有助于他们在物理空间、组织空间和网络空间之间实现“自由穿梭”。当这种高度的个体流动性融入他们的职业灵活性和工作自主性时,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身份建构也就变得愈发复杂。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人类学研究员戴夫·库克进一步探析了数字游民的本质^[8]。他认为,数字游民是那些充分利用便携式通信技术与互联网接入来进行远程工作的群体。但与一般远程工作者不同,数字游民同时注重工作和旅行,并对迁徙频率和地点选择拥有极强的自主权,每年至少访问三个不属于自己、朋友或家人的地方。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数字游民代表了一种新兴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一方面,数字游民不再依赖传统的办公室工作模式,而是采用一种高度灵活的工作方式。另一方面,他们以个人兴趣和爱好为工作的主要动力,追求工作与休闲之间的动态平衡,旨在实现个人的自由发展。

二、西方数字游民研究的核心议题

作为一个涵盖多个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数字游民涉及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地理学、经济学、信息技术以及旅游管理等。近年来,西方数字游民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学者们通过专业会议、学术期刊和其他学术出版物等各类途径广泛发布和传播其研究成果。尤其在学术期刊发表方面,国际顶级期刊如《工作、就业与社会》(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世界休闲杂志》(World Leisure Journal)、《新媒体与社会》(New Media & Society)、《社交媒体与社会》(Social Media + Society)、《移动人

文》(Mobility Humanities)、《社会文化地理学杂志》(Journal of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信息技术与旅游》(Information Technology & Tourism)等,已经成为数字游民研究的重要阵地。总体来说,个体流动、地理套利、工作与休闲平衡、线上与线下社区营建等议题构成了西方学者关注的核心。

1. 个体流动

流动性是数字游民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丹尼尔·施拉格温和穆罕默德·侯赛因·贾拉希强调,与其他远程工作方式如弹性工作和联合办公相比,数字游民表现出更高的流动性^[9]。此外,不同数字游民之间的流动性程度存在差异。新西兰女性主义学者伊娜·赖兴伯格根据这种差异,将数字游民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在工作地点上有灵活选择权,但不在旅行时工作的数字游民;第二等级是保留永久居留权,并利用各种机会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旅行的数字游民;第三等级是放弃永久居留权,全身心投入流动生活的数字游民^[10]。她的研究发现,与第一等级的数字游民相比,第二等级和第三等级的数字游民更强烈地认同数字游民的身份特征,这也为他们的全球流动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全球流动给数字游民带来了哪些影响?法比奥拉·曼奇内利认为,全球流动不仅体现为一种不受限于固定地点、将工作与休闲紧密结合的生活方式,更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体验,同时也是建构自我认同的基本要素^[11]。这种观点与赖兴伯格的观点相呼应,后者强调数字游民的流动生活有助于他们在各种复杂的身份认同中定义和理解自己。此外,安东尼·达安德里亚进一步指出,流动性将个人置于创造自身生活环境的中心,激发他们进行自我表达,不断探索自己的极限和能力。数字游民自身的知识、经验和能力是建构数字游民社群的重要基石,而这些以共同文化、价值观念和兴趣爱好为纽带的社群,正在成为挑战传统的重要力量^[12]。

然而,一些学者警醒地意识到,数字游民的全球流动并非毫无限制^[13]。首先,新媒体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突破性发展对数字游民至关重要,使他们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工作和旅行^[14]。奥尔加·汉农认为,与背包客相比,数字游民更依赖数字技术来完成工作和专业活动,因此更倾向于选择拥有良好网络基础设施的目的地^[15]。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积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和5G移动网络建设,以满足数字游民的需求。例如,意大利政府在2021年启动了“国

家数字化转型计划”,投入30亿欧元用于改善全国超高速网络,计划在2026年实现全国范围内1Gbps的下载速度和200Mbps的上传速度。

其次,数字游民的流动性与各国的签证和居留政策直接相关。为了吸引更多经济实力较强的数字游民,加勒比海岛国巴巴多斯于2020年6月率先推出了全球首个数字游民签证。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最新报道,全球已有超过25个国家或地区推出数字游民签证,旨在打造本地高水平的创业生态系统,优化当地营商和投资环境,为外籍人士的长期旅居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16]。

最后,学者杰里米·阿罗尔斯等提出,数字游民是否能够自由、轻松地跨越国家或地区边界,与他们的经济条件、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高度关联^[17]。意大利数字游民协会于2022年进行的一项针对在意大利的数字游民的调查显示,2251位受访者中,大多数是高级知识分子(42%拥有学士学位,31%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平均年龄为37岁,52%拥有稳定的工作,主要从事与传播、营销、教育、培训、信息产业等专业工作^[18]。与传统移民不同,他们通常具备良好的经济基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突出的工作能力,因此他们“寻找的不是工作,而是更适合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与普通游客不同,数字游民可以为吸纳他们的地区带来大量宝贵的经济机会。

此外,数字游民流动的持续性也受到不少研究者的质疑。例如,保罗·格林认为,数字游民未必能够不断地流动,因为一旦他们找到相对舒适和满意的生活环境,就会产生依恋感,缺乏继续旅行的动力,这与他们对流动的渴望是相互矛盾的^[19]。帕特里夏·马托斯和埃莉森达·阿尔德沃尔也认同这一观点,并强调数字游民更关注个体流动的潜力,而非流动本身^[20]。因此,潜在的数字游民就很关键了。他们对游牧式生活充满兴趣,正准备在未来全身心地投入流动的生活。据调查,目前美国至少有7200万名潜在的数字游民,其中许多人将在外部条件更加成熟时采纳游牧式生活方式。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这股力量不容小觑^[21]。

2. 地理套利

美国著名作家蒂姆·费里斯敏锐地洞察到,众多数字游民选择在生活成本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度过大部分时间^[22]。曼奇内利的研究也揭示出,数字游民倾向于在不同生活成本的目的地之间流动,以灵活地平衡生活成本与收入,进而活得更潇洒^[23]。

由此可见,“地理套利”成为数字游民“生活方式设计”的关键要素。根据里奇·卡尔加德的看法,“地理套利”通常用于描述不同地理位置之间存在的资源或利益差异,从而使企业、组织或个人通过移动或选择不同的地点来获取更多的经济或其他优势^[24]。实际上,地理套利是一种常见的企业策略。企业会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来生产产品,然后将这些产品销售给发达国家的高收入人群,以实现盈利。类似地,数字游民也是地理套利策略的忠实实践者。他们在高生活成本地区赚取收入,然后将日常开支转移到生活成本较低的地区,以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和更多的生活可能性。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教授王爱华从全球劳动力分工的视角深入剖析了高生活成本和低生活成本地区这组概念。她将高生活成本地区定义为全球劳动力分工体系中的“高纬度”区域,而低生活成本地区则为“低纬度”区域,并强调两者既是全球经济结构不平等的产物,也是个体选择不同“地理套利”行为策略的现实基础。她进一步指出,地理套利与“弹性公民权”的文化逻辑相吻合,都强调“对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条件做出流变的和机会主义式的回应”^[25]。这使得数字游民在权利和义务方面具有更高的灵活性。

数字游民的地理套利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并加速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然而,他们也遭到当地人的质疑,被冠以“新殖民主义者”的名号^[26]。相关报道和研究指出,在地理套利过程中,数字游民往往会加速当地的中产阶层化或士绅化进程,严重扭曲当地房地产市场,导致物价普遍上涨,许多本地居民不得不迁移到更遥远、更为廉价的地方^[27]。中产阶层化或士绅化现象还滋生出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如经济失序、货币贬值、生存资源紧张、犯罪活动增加等。因此,在一些城市中,数字游民已不再被当地居民视为新生活的“先驱”,而被嗤为“瘟疫”。不满和厌恶的声音此起彼伏^[28]。

当然,地理套利不仅指数字游民为了节省生活成本而实施的“在高收入地区赚钱,去低消费地区生活”策略,还包括他们选择比现居住地自然环境更好、文化体验更丰富,或更能满足其社交需求的地方居住。因此,泰国的曼谷和清迈、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德国的柏林、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葡萄牙的里斯本备受全球数字游民的青睐,成为该群体最理想的聚居地。

3. 工作与休闲平衡

自由流动赋予数字游民对生活方式的掌控权,使他们能够自主安排工作和休闲时间。在工作和休闲时间的分配方面,安妮卡·穆勒认为,数字游民追求一种“将工作时间最小化,而将休闲时间最大化”的生活方式,力求实现“早上能够完成工作、然后下班,下午去冒险”的理想状态^[29]。然而杰西卡·博蒙特却认为,数字游民既是移动远程工作者,也是持续的旅行者,因此他们在工作的同时也在旅行、学习、创业和交友,努力实现工作与休闲之间的动态平衡,而不只注重休闲^[30]。克劳汀·博诺等学者也认为数字游民不只关注休闲,他们特别强调自己在工作中的专业能力和态度。数字游民更倾向于选择有趣、有成就感、有挑战性,并能更好展现自己能力的工作^[31]。专业化知识和技能使他们区别于其他具有高流动性的群体(如背包客),这也是许多数字游民聚居地政府把他们当作高质量的人才追捧的主要原因^[32]。

然而,部分学者对这种所谓的“平衡”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他们认为,数字游民的流动性导致工与休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甚至消失。由于大部分人并没有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竞争,需要不断寻找零工工作以维持生计。因此,他们常常过劳,工作也可以在各种地点进行,例如共享工作空间、共享生活空间、咖啡馆、公园,甚至是公交车。换句话说,大部分数字游民希望在共享工作空间内完成工作、享受闲暇时光,进而将工作与休闲分隔开来,但这种愿望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诚如塔拉·邓肯等学者所述,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地点上看,工作与休闲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数字游民努力实现勉强平衡的尝试很有可能成为徒劳之举^[33]。

有学者指出,数字游民工作的性质也直接决定了工作与休闲之间边界的模糊,甚至是消失^[34]。大部分数字游民是零工劳动者(主要涉及在线教育、翻译、专业辅导等领域),他们需要通过打造和推广个人“品牌”在按需劳动力平台(例如UpWork、Fiverr、MTurk等)上迅速、高效地找到合适的工作。因此,自我品牌化构成了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35]。这就要求数字游民频繁地更新社交媒体、个人博客、网站或播客来全方位展示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自我营销的方式扩大自身的影响力^[36]。在许多学者看来,这个过程不仅涉及数字游民个人博客、网站、播客以及个人故事的深度商品化,还与他们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相互交融,两者都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深远影响。

换言之,在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的支配下,数字游民无论何时何地,都需要像运营创业项目一样来管理自己高度流动的生活。当数字游民将自己视为“我的公司Me Inc首席执行官”时,他们的工作将全方位渗透于生活的时空,使工作与休闲紧密交织,进而打破两者之间的平衡。更为严重的是,自我品牌化造成对数字游牧式生活方式过于容易维持的期望与假设,从而淡化甚至遮蔽了数字游民在维护数字身份时,在工作数量和强度方面所面临的挑战^[37]。

4. 线上与线下社区营建

以上情况使数字游民难以摆脱“长时间、高强度工作”的现实困境,加之与“家”和“家人”疏离所带来的情感问题,经常使他们深陷持续高压和焦虑之中^[38]。尤其是当数字游民置身于陌生的环境时,生活的压力和焦虑会加剧他们所感受到的文化冲击,导致他们难以融入当地社群,从而无法获得经济、社会和情感上的支持^[39]。因此,许多学者特别关注数字游民可能获得的组织化或结构化支持,这其中,线上与线下社区的营建是他们格外关注的议题。

有学者提出,数字游民社区提供的社会支持是减轻压力和焦虑“良方”,能够为数字游民打造一种“家”的感觉^[40]。作为“生活家园”,数字游民社区既包括线下社区,又包括线上社区。在查尔斯·吉尼翁看来,线下和线上社区的相互融合是数字游民将“断裂、疏离、碎片化、异化的自我与周围同质个体重新联系起来”的关键^[41]。

在线下社区方面,尤其是在数字游民较为集中的共享工作和生活空间中,管理者组织的各类活动和大量的公共活动空间推动了数字游民的社区化。用汤普森的话来说,这为数字游民原本孤独的生活提供了一条不可替代的“社交生命线”^[42]。通常情况下,线下社区组织两类活动,一类是社交活动,如午餐会或聚会,另一类是技能分享活动^[43]。线下社区既是一个知识和经验交换的场域,也是满足数字游民个性化和专业化需求的地方。与此同时,当数字游民聚集在一起时,他们能够建立深入和持久的人际关系,拓展社交网络,获得归属感和自我认同,并提升幸福感^[44]。乔万娜·马斯克罗尼的研究进一步发现,数字游民越是与那些拥有相似社会身份、兴趣爱好、价值观念和生活目标的数字游民交往,其幸福感指数提升就愈加明显^[45]。

与线下社区相比,线上社区不仅是数字游民与同类结交朋友,快速建立亲密关系的地方,也是他们讨

论与游牧生活方式相关问题的重要平台。他们常通过在线论坛和他人撰写的旅行日志来收集和获取各类专业知识和实用信息,例如税务和签证事务。同时,以NomadList为代表的各类线上社区也为数字游民提供了有关不同地方工作、生活和旅行的最新攻略,支持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46]。

然而,一些学者对社区营建进行了反思。例如,汤普森认为,一方面,线上与线下社区都由男性主导,存在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使个体在社区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另一方面,社会性别常与种族、民族和国籍交织在一起,使社区内部的等级化结构变得更加复杂。许多社区对女性、同性恋群体、有色人种和其他社会边缘化群体展现出冷漠,甚至是敌对的态度^[47]。此外,博蒙特强调,并非所有数字游民都会认同或完全融入社区,他们可能因为否定社区价值观或行业、工种不同而受到排斥^[48]。此外,数字游民很少与当地人或组织建立有机联系,他们发现融入当地的传统和文化并不容易,这也是为什么数字游民与地方之间隔膜感始终难以消除的原因所在。

三、西方数字游民研究述评

正如前文所述,西方学者在个体流动、地理套利、工作与休闲平衡、线上与线下社区营建等核心议题上进行了大量兼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但也有些未充分讨论的问题,有待后续研究者进一步深化。

首先,流动性是数字游民的主要特征之一,帮助他们跨越不同物理空间、组织空间和网络空间的边界,使他们在职业领域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同时具备更强的工作自主性。不同的研究者对流动性进行了分类和阐述,将他们划分为不同的层次。这种差异性包括从灵活选择工作地点但不在旅行时工作的数字游民,到完全抛弃永久居留权,全身心投入流动生活的数字游民。这种分类有助于更完整地理解数字游民群体内部多样性及其对流动生活的态度。但仍有问题,比如,数字游民全球流动的动力源于何处?是如赖兴伯格所言的数字游民身份特征,还是他们对改变生活方式、追求自由选择 and 实现个人价值的渴望?这值得进一步研究。

其次,地理套利是数字游民优化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关键策略。它表面上是个体为获得更好生活体验 and 经济效益所作的理性选择,但其背后却是全球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问题。数字技术在地理套利中的作用,以及它是否能从本质上解决地理套利可能带来的问

题,还是将损失转嫁到无法迁移的人群身上,需要更深层次的分析研究。此外,在数字游民地理套利行为中,如何平衡他们在居住地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也是一个有待全面探讨的议题。

再次,工作与休闲平衡是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核心挑战之一,研究者们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多样化的观点。相关研究关注数字游民通过个人品牌化迅速高效地寻找工作、建立人际网络和提升职业声誉的实践,进而反思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工作伦理对个体工作与休闲的支配作用,这也是工作全方位渗透到休闲时空中的主要原因。尽管有较多研究关注短期内数字游民的工作与休闲平衡,但总体而言,既有研究仍缺乏从更长时间段或周期出发,系统考察工作与休闲的关系,以及对个体职业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持续影响。

最后,线上和线下社区营建是数字游民社交和支持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关键支撑。相关研究从多个维度阐述数字游民社区如何在信息共享和情感连接方面助力他们更好地应对孤独、减轻工作压力和缓解生活焦虑等问题。然而,两类社区的内部运作和治理机制、社区文化的塑造,以及数字游民情感满足或补偿机制等问题亟待深入探究。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四个核心议题存在着密切联系。首先,个体流动与地理套利相关。数字游民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尤其是在不同生活成本居住地之间的迁移,使他们能够实现“地理套利”,从而践行“在高生活成本地区赚钱,在低生活成本地区消费”的工作生活方式。其次,个体流动和工作与休闲平衡相关。自由流动赋予了数字游民控制自身生活方式的权利,使他们获得了分配工作和休闲时间的自主权。然而,大多数数字游民不得不时刻像运营创业项目一样管理自己高度流动的生活,导致工作与休闲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甚至消失。最后,工作与休闲平衡和线上与线下社区营建相关。数字游民不仅需要应对工作与休闲平衡被打破后可能带来的“长时间、高强度工作”的现实困境,还必须处理因脱离传统固属社群而产生的各种情感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营建数字游民线上和线下社区变得异常必要且迫切。这些社区不仅有助于解决数字游民的孤独问题,为他们提供宝贵的“社交生命线”,同时也成为他们探讨与游牧式工作生活方式相关各类问题的重要平台。这些议题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有待相关学者结合不同国家或地区、年

龄、性别、种族、职业、教育背景的数字游民进行深入剖析和反思。

四、西方数字游民研究的中国启示

虽然中国数字游民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成果尚不算丰富,但中国学者已经对其中的几个典型职业群体展开了全面且充分的研究。举例来说,在网络主播研究方面,戴颖洁和吕梓剑两位研究者通过对W品牌电商公司的田野调查和13位相关人员的半结构化访谈发现,一方面,网络主播深陷“强制规范”、“工作量化”和“内忧外患”的劳动处境,遭受着品牌方、平台和自我的三重剥削,进而出现主体价值降级、主体自我他塑、主体认同迷失、主体之间竞争等情况,其能动性、自主性、创造性全方位下降;另一方面,他们采取虚假打卡、自主跳槽等方式进行反抗,劳资关系因此处于一种长期的、循环的博弈状态^[49]。在短视频创作者研究方面,周孟杰借鉴安德烈亚斯·赫普的传播“型态”框架,对返乡青年的短视频实践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深层审视,发现这些返乡青年通过短视频创业等方式推动了乡村“内生性”向数字“内生性”的转型,同时帮助他们对抗算法“幽灵”,整合乡村分散的要素,重新塑造乡村共同体^[50]。在网络文学写手研究方面,胡慧和任焰两位学者颇具启发性地指出,平台通过“兴趣梦”与“财富梦”等方式与写手形成劳动“共识”,并以众包生产体制实现资本跨时空、跨阶级的弹性积累,打破了劳动者工作与闲暇的界限,使劳动异化延伸至他们的生活世界^[51]。

在这些研究中,我们不难察觉,西方数字游民研究与中国大陆学者的工作存在诸多共同议题和相似的社会关切。具体来说,数字经济为个体提供了更自主和更灵活的工作机会,但同时也给劳动者带来了不稳定和缺乏社会保障的挑战。这种情况不仅在西方存在,也是当前大多数中国数字游民不得不面对的现状^[52]。

此外,许多西方国家或地区开始推出针对数字游民的特殊签证和居留许可,旨在吸引这类短期居住者,以缓解新冠疫情对旅游业和相关行业造成的冲击^[53]。同样,为了吸引人才、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本的长期注入,为疫情影响下的数字经济开辟新商机,积极吸纳和拥抱数字游民也成为国内一些地方政府的主要策略。近几年,数字游民共享工作和生活空间在浙江安吉、云南大理、海南万宁等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西方学者对数字游民工作与生活空间的考察和研

究为国内相关领域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经验。在共享工作和生活空间中,中国数字游民与大多数西方数字游民一样,经常受到工作与休闲边界模糊、情感孤立等问题的困扰。这些问题与前文提到的不稳定工作状态和缺乏社会保障问题相互缠绕,共同构成了中国数字游民群体在现代性背景下的生存困境。通过系统梳理、归纳和评述西方数字游民研究成果,或许能为中国大陆学者的相关探讨提供可借鉴的启示,进而更深刻理解和有效应对上述困境,并在此基础上,理性、全面、客观地分析中国数字游民这一新型社会群体带来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迁。这也为国际学术界在数字游民议题上展开学术对话和思想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

当然,中国学界在借鉴和汲取西方相关理论成果的同时,必须充分认识到中西方数字游民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有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价值观念、政策环境,以及数字游民工作和生活所依托的平台媒体等层面的,也包括中国“乡村振兴”和“数字乡村”发展规划对于数字游民的深远影响等。理解这些差异对于深入探讨与中国数字游民相关的问题至关重要。

首先,虽然中国社会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也呈现出高度流动的特征,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不小的差异,这会导致中国数字游民在面对流动时,与西方数字游民在态度上存在差异。分析和研究这些差异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中国数字游民流动的动机和行为。

其次,从政策环境的角度来看,户籍制度可能会导致中国国内数字游民在流动时面临西方学界不熟悉的隐性特殊经验。我们亟须关注相关政策对中国数字游民流动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并探讨如何优化政策以更好地支持国内数字游民的长期且健康发展。

再次,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平台媒体的发展与国家发展规划以及政府的政策监管存在更为密切的联系^[54]。这可能会对高度依靠平台媒体的数字游民在工作和生活方面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我们应深入研究平台媒体对数字游民工作和生活的作用机制,同时也需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优化平台经济的政策环境,以支持数字游民的发展和流动方式,并为他们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

最后,中国当前“乡村振兴”和“数字乡村”发展规划对数字游民的广泛影响值得关注。当下,不少

农村地区已经具备了为数字游民提供既有生活品质又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工作场景的能力^[55]。越来越多的“数字游民”选择在农村定居,转变为“数字乡民”。他们通过创建工作室、实训基地、创业小镇等方式,积极参与到中国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浪潮中。这无疑对中国的乡村发展,尤其是“数字乡村”的建设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对于上述问题的深入思考将为中国数字游民研究开辟一条不同于西方“土绅化”“地理套利”的新路径,同时也为数字游民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五、余 论

在本文的结尾,让我们再次把讨论的焦点拉回当代中国青年与数字游民之间的关系上。有学者认为,当代青年处于现代化机器的运转中,面对工作异化和内卷化,深受资本剥削,难以维护主体性^[56]。那么,数字游民身份的选择是青年人摆脱这些状况的一种有益尝试吗?如果是,我们还需要追问:哪些结构性力量能够帮助数字游民减轻孤独、焦虑和不安?我们看到,浙江安吉、云南大理、福建泉州、河南信阳、海南万宁和陵水等地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数字游民公社或基地,吸引着对内卷化生活感到厌倦的青年群体。在这些公社或基地中,不同职业的数字游民在共享厨房中协作,定期举办主题沙龙和艺术市集,秉持平等、共享、自由、协作的精神,共同构筑起一个“类乌托邦世界”。这个“类乌托邦世界”对青年群体有何现实意义?它的未来将会如何发展?这些问题与当代青年的发展和国家的未来走向息息相关,因此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和重要的研究价值,值得跨学科研究者们共同深入探索和思考。■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沈逸寒同学在部分文献收集和整理方面对本文亦有贡献,在此表示感谢)

[基金项目:本文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科研创新项目、复旦大学亚州研究中心2023年度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姚建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全球传播
全媒体研究院研究员

杨涵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汪永涛

参考文献:

- [1] Makimoto T, Manners D. Digital Nomad [M].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97: 3.
- [2] Ehn K, Jorge A, Marques-Pita M. Digital Nomads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Narratives about Relocation in a Time of Lockdowns and Reduced Mobility [J]. Social Media + Society, 2022, 8 (1): 114-129.
- [3] 转引自博雅研究. 数字游民的诗与远方 [EB/OL]. <https://www.onpku.com/News/industry/2022/0913/1680.html>, 2022-09-13.
- [4] 转引自中创侨智. 数字游民全球现状 [EB/OL]. <https://www.otgeo.com/1330.html>, 2023-08-05.
- [5] 智联招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22 雇佣关系趋势报告——数字时代的多元雇佣关系 [EB/OL]. <https://mp.weixin.qq.com/s/JebdI2E1sfulFGYgHQ4ddw>, 2022-10-12.
- [6] [42] [47] Thompson B Y. Digital Nomads Living on the Margins: Remote-Working Laptop Entrepreneurs in the Gig Economy [M]. Bingley, UK: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 2021: 2-3, 90.
- [7] Nash C, Jarrahi M H, Sutherland W, et al. Digital Nomads beyond the Buzzword: Defining Digital Nomadic Work and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8: 207-217.
- [8] Cook D. What is a Digital Nomad? Definition and Taxonomy in the Era of Mainstream Remote Work [J]. World Leisure Journal, 2023, 65 (2): 1-20.
- [9] Schlagwein D, Jarrahi M H. The Mobilities of Digital Work: The Case of Digital Nomadism [C] //ECIS, 2020.
- [10] Reichenberger I. Digital Nomads: A Quest for Holistic Freedom in Work and Leisure [J]. Annals of Leisure Research, 2018, 21 (3): 364-380.
- [11] Mancinelli F. Digital Nomads: Freedom, Responsibility and the Neoliberal Order [J].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Tourism, 2020, 22 (3): 417-437.
- [12] D' Andrea A. Global Nomads: Techno and New Age as Transnational Countercultures in Ibiza and Goa [M]. London: Routledge, 2007.
- [13] Matos P, Ardévol E. The Potentiality to Move: Mobility and Future in Digital Nomads' Practices [J]. Transfers, 2021, 11 (3): 62-79.
- [14] Busch E, Nash J, Bell B S. Remote Work: An Examination of Current Trends and Emerging Issues [R]. Ithaca, NY: Center for Advanced Human Resource Studies, Cornell University, 2011: 6.
- [15] Hannonen O. In Search of a Digital Nomad: Defining the Phenomenon [J].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Tourism, 2020, 22: 335-353.
- [16] 环球时报. 吸引“数字游民”, 英媒: 全球超 25 国推出“数字游民签证” [EB/OL]. <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2022-07-13/doc-imizirav3142596.shtml>, 2022-07-13.
- [17] Aroles J, Bonneau C, Bhankaraully S. Conceptualising “Meta-Work” in the Context of Continuous, Global Mobility: The Case of Digital Nomadism [J].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2022: 1-18.
- [18] 联合新闻网. 意大利想做“数字游牧者”(上): 逃离办公室的远程工作时代 [EB/OL]. [https://newsbeezer.com/taiwan/意大利想做“数字游牧者”\(上\): 逃离办公室的, 2023-07-21](https://newsbeezer.com/taiwan/意大利想做“数字游牧者”(上): 逃离办公室的, 2023-07-21).
- [19] Green P. Disruptions of Self, Place, and Mobility: Digital Nomads in Chiang Mai, Thailand [J]. Mobilities, 2020, 15(3): 431-445.
- [20] Matos P, Ardévol E. The Potentiality to Move: Mobility and Future in Digital Nomads' Practices [J]. Transfers, 2021, 11 (3): 62-79.
- [21] [28] 虎嗅. 快乐的数字游民, 卷成了招人恨的“全球瘟疫” [EB/O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9859764798707722&wfr=spider&for=pc>, 2023-06-27.
- [22] Ferriss T. The 4-Hour Workweek: Escape 9-5, Live Anywhere, and Join the New Rich [M].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2007.
- [23] Mancinelli F. Digital Nomads: Freedom, Responsibility and the Neoliberal Order [J].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Tourism, 2020, 22 (3): 417-437.
- [24] Karlgaard R. “Outsource Yourself.” Forbes Magazine [EB/OL]. <http://www.forbes.com/forbes/2004/0419/033.html>, 2004-04-19.
- [25] Ong A.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6.
- [26] Hayes M. “We Gained a Lot over What We Would Have Had”: The Geographic Arbitrage of North American Lifestyle Migrants to Cuenca, Ecuador [J].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14, 40 (12): 1953-1971.
- [27] Barabanov O. Neo-Colonial Practices and Global Digital Equality [EB/OL].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neo-colonial-practices-and-global-digital-equality/>, 2023-03-14; Mancinelli F, Noel B S. Introduction: Understanding Neo-Nomadic Mobilities beyond Self-Actualisation [J]. Mobility Humanities, 2023, 2 (2): 1-6.
- [29] Müller A. The Digital Nomad: Buzzword or Research Category? [J]. Transnational Social Review, 2016, 6 (3): 344-348.
- [30] Beaumont J. Digital Nomads and Sense of Place: A Case Study of Lisbon [M]. Wageningen, Netherlands: Wageningen University, 2019.
- [31] [34] [37] Bonneau C, Aroles J, Estagnasié C. Romanticisation and Monetisation of the Digital Nomad Lifestyle: The

- Role Played by Online Narratives in Shaping Professional Identity Work [J]. Organization, 2023, 30 (1): 65–88.
- [32] Wang B, Schlagwein D, Cecez-Kecmanovic D, et al. Digital Nomadism and the Market Economy: Resistance and Compliance [C]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Munich, Germany, 2019.
- [33] [38] Duncan T, Cohen S A, Thulemark M. Lifestyle Mobilities Intersections of Travel, Leisure and Migr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2014.
- [35] Cook D. The Freedom Trap: Digital Nomads and the Use of Disciplining Practices to Manage Work/Leisure Boundaries [J].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Tourism, 2020, 22 (3): 355–390.
- [36] Woldoff R A, Litchfield R C. Digital Nomads: In Search of Freedom, Community, and Meaningful Work in the New Econom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 [39] Germann M J. Global Abode: Home and Mobility in Narratives of Round-the-World Travel [J]. Space and Culture, 2008, 11 (4): 325–342.
- [40] Walsh K. “Dad Says I’m Tied to a Shooting Star!” Grounding (Research on) British Expatriate Belonging [J]. Area, 2006, 38 (3): 268–278.
- [41] Guignon C. On Being Authentic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126.
- [43] Hearn A. Meat, Mask, Burden: Probing the Contours of the Branded Self [J].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2008, 8 (2): 197–217.
- [44] von Zumbusch J S H, Lalicic L. The Role of Co-living Spaces in Digital Nomads’ Well-Being [J].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Tourism, 2020, 22 (3): 439–453.
- [45] Mascheroni G. Global Nomads’ Network and Mobile Sociality: Exploring New Media Uses on the Move [J]. Information, Community and Society, 2007, 10 (4): 527–546.
- [46] Bozzi N. #digitalnomads, #solotravellers, #remoteworkers: A Cultural Critique of the Traveling Entrepreneur on Instagram [J]. Social Media + Society, 2020, 6 (2): 1–15.
- [48] Beaumont J. Digital Nomads and Sense of Place: A Case Study of Lisbon [J]. Wageningen, Netherlands: Wageningen University, 2019.
- [49] 戴颖洁, 吕梓剑. 数字劳工的主体性及其发展走向——基于品牌带货主播异化劳动的研究 [J].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22 (5): 72–85.
- [50] 周孟杰, 徐生权, 吴玮. 媒介逻辑何以嵌入行动——返乡青年短视频研究 [J]. 当代青年研究, 2022 (1): 66–73.
- [51] 胡慧, 任焰. 制造梦想: 平台经济下众包生产体制与大众知识劳工的弹性化劳动实践——以网络作家为例 [J]. 开放时代, 2018 (6): 178–195+10.
- [52] Sutherland W, Jarrahi M H. The Gig Economy and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The Case of the Digital Nomad Community [J]. Proceedings of the ACM 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2017, 1: 1–24.
- [53] de Almeida M A, Correia A, Schneider D, et al. COVID-19 as an Opportunity to Test the Digital Nomad Lifestyle [C] // 2021 IEEE 2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in Design. Dalian, China, 2021: 1209–1214.
- [54] Plantin J C, De Seta G. WeChat as Infrastructure: The Techno-Nationalist Shaping of Chinese Digital Platforms [J].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9, 12 (3): 257–273.
- [55] 上观新闻. 关注乡村振兴中的“数字乡民” [EB/OL]. <https://export.shobserver.com/baijiahao/html/623229.html>, 2023-06-16.
- [56] 吴维忆. 数字游民如何再造“地方” [N/OL]. 社会科学报, <http://shekebao.com.cn/detail/6/24346>, 2023-01-05.

(上接第 118 页)

- [39] 参考消息网. 欧盟九国联合要求以“欧洲方式”反击美《通胀削减法案》 [EB/OL]. <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221210/2498176.shtml>, 2022.
- [41] 赵俊杰. 欧洲政治精英应走出“封闭循环” [EB/OL]. <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A9VknhWloy>, 2022.
- [42] 参考消息网. 卢基扬诺夫: 欧洲掉进依附美国的陷阱 [EB/OL]. <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22/1211/2498269.shtml>, 2022.
- [43] [英] 阿里斯·鲁西诺斯. 欧洲危机四伏, 而领导人却茫然无知 [EB/OL]. https://www.guancha.cn/ArisRoussinos/2022_10_18_662603.shtml, 2022.
- [46]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71.
- [47] 马峰. 南非青年参与社会发展价值观研究——基于风险社会与文化转型双重语境下的价值观分析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10): 51.
- [48] 习近平.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J]. 求是, 2021 (20).